

刘向父子的汉赋研究

踪 凡

据典籍记载，最早整理汉赋的恐怕是西汉的司马迁，他在《史记》中全文载录了贾谊、司马相如的 6 篇赋作。东汉班固的《汉书》、南朝梁范晔的《后汉书》继其踵武而又发扬光大，二书整理、载录的汉赋共有 11 家，30 篇。不过，史官的整理仅限于成就较高，影响较大的少数名作，并且其搜集的写本未必完备，校勘的方法相对简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第一次对当时的所有汉赋进行整理与编录工作的，应是西汉末年的刘向、刘歆父子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总序》云：“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可见刘向不仅分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三大类书，而且为每本书编制目录，撰写提要，进献给皇帝。下文又云：“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，有《六艺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术数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。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。”据陆侃如先生《中古文学系年》考证，刘歆于河平三年（前 26）即为黄门郎，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秘书，当时年仅二十余岁。至绥和元年（前 8）刘向卒时，歆已四十岁，已有了十八年校定群书的经验。此时他“复领五经，卒父前业”

(《汉书·刘歆传》),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,就撰成了《七略》。可以推知,刘向《别录》的写作,有其子刘歆的功劳;而刘歆《七略》的撰成,更吸收了乃父刘向的研究成果^①。班固“删其要,以备篇籍”,实际上也只对《七略》作了些“删去浮冗,取其指要”(颜师古《汉书注》)的工作^②。所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并非班固自撰,而是《七略》的精要,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刘向父子的文献学成果。下面即以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为据,参照其他文献资料,探讨刘氏父子对汉赋研究的贡献。

一、汉赋的搜集、校勘与编定

自高祖建汉(前206)至汉成帝(前32年—前7年在位)时代,约有200年之久。其间产生的汉赋作品数以千计。有的赋作已进献给皇帝(班固《两都赋序》:“孝成之世,论而录之,盖奏御者千有余篇。”),有的在民间流传,当然也有些自娱之作尚未流传就已佚失。陈农、刘向等人努力把这些作品集中在皇家图书馆,必然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搜集、网罗工作。他们不仅搜罗不同赋作,而且要搜罗同一赋作的不同抄本以备参校。至于具体的搜罗、参校的情况,刘向在各家赋的叙录中作了明确交代。可惜这一类叙录几乎已全部失传,我们从现存的《管子叙录》、《列子叙录》、《关尹子叙录》、《子华子叙录》等可知,刘向在校书时所搜集、依据的版本很多,包括中书、太常书、太史书及大臣私人藏书等。所谓“博求诸本,乃得讎正一书,则因得广储以待质也。”(章学诚《校讎通义·校讎条理》)当然,汉赋产生于汉代,不像先秦古书抄本众多,流派纷呈,有的还有今古文之别,讎正一书实非易事。但刘向之前200年间,汉赋不断地产生,不断地传抄,不断地进献,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有妄改字句,以讹传讹的情况。并且主要抄写传播的工具是竹简,若保存不善,断简、错简、虫蚀、霉烂的情况也在所难免。所以,我们推测刘向曾像对待先秦古书那

样，对汉赋的不同抄本进行了一番搜集、校定的工作，当不会有错。

刘向校书主要使用本校法和对校法，他本人对此就有所说明。《文选·魏都赋》注引《风俗通》云：“刘向《别录》：‘校讎：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为讎。’”校讎的内容主要是订正讹脱窜乱的文字，脱字补之，误字改之，遂得善本。有时也涉及到篇章的增删排定，如《管子叙录》云：“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，以校，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，定著八十六篇。”意思是说，各家抄本互有重复，刘向将重复的内容予以删除，互异的内容加以保留，重新编定次序，从而得到一本篇目最全、文字最精的《管子》。刘向校理汉赋时，恐怕也涉及到这些内容，使用了这些方法，可惜有关记载失传，无法窥其一斑，更不得见其“全豹”了。

二、汉赋叙录的撰写

令后人感到欣慰的是，《七略》的精要内容毕竟因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载录而得以保存下来，这是班固的一大贡献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总序》云：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梁阮孝绪《七录序》说得更具体：“昔刘向校书，辄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随竟奏上，皆载在本书。时又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，即今之《别录》是也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云：“每书就，向辄撰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叙而奏之。”由此可知，刘向曾经为每本书都撰写了叙录，附在各书之后。将各书的叙录抽出来结为一集，便是《别录》。从上引文字及今存《战国策叙录》、《晏子叙录》、《孙卿子叙录》等可以看出，刘向《别录》大致包括以下内容：篇目编次，校勘说明，作者介绍，评论思想内容，探究学术源流，考辨真伪，权衡价值等。所以，刘向在《别录》中对其所编定书籍的方方面面都介绍得非常详细，几乎相当

于今日所说的解题、提要或简介，对于读者阅读、理解原书大有帮助益。这是刘向的创举。正如孙钦善先生所说：“至于校理群书而撰叙录，以刘向为始，从此开解题目录之先河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”^③

据严可均《全汉文》的辑录，刘向曾为诸子一大类书中的《晏子》、《孙卿子》（儒家）、《列子》（道家）、《邓析子》（名家）等书撰写了叙录，以此类推，他必定也曾为诗赋一类书中的《屈原赋》、《司马相如赋》、《扬雄赋》等书（章学诚以为是早期的作家别集）撰写叙录。这种类推并非毫无根据。因为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七略》的编写结构有总略、流派、别集（书）三个层次，如下图：

诸子略——道家者流——列子八篇

诗赋略——屈原赋之属——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

显然可见，《司马相如赋》29篇与《列子》8篇都属于第三个层次，即别集（书）的范畴。既然有《列子叙录》，也应该有《司马相如赋叙录》，区别只在于前者有幸保存下来而后者却已全部佚失。但两者的体例、结构、内容应该没有太大区别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南朝宋裴骃《集解》引了一条刘向评贾谊《吊屈原赋》的佚文：“刘向《别录》曰：‘因以自谕自恨也。’”毫无疑问，刘向这句话应出自他的《贾谊赋叙录》，一语道破了《吊屈原赋》的创作主旨。所谓“自谕”，是指贾谊以屈原的不幸来比拟自己的遭遇；所谓“自恨”，是指该赋借追悼屈原，来抒发自己有志难酬的憾恨和人生多艰的感慨。刘向同时看出了这两点，比班固“谊追伤之，因以自谕”的解释更为全面、贴切。《贾谊赋叙录》对贾谊七篇赋的分析阐发肯定还有更精彩的地方，只可惜已无从知其详了。严可均《全汉文》还辑录了几条与汉赋有关的《别录》佚文，今查核校对，迻录如下：

1. 淮南王有《薰笼赋》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一一引刘向

《别录》云云。又见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五)

2. 向有《芳松枕赋》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七〇七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。《白氏六帖》卷四作《芳松赋》)

3. 向有《合赋》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一七引刘向《别传(当为“录”)》云云)

4. 有《麒麟角杖赋》。(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三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一〇引刘向《别传(当为“录”)》作“有麒麟角杖〇”。又见《事类赋注》卷一四)

5. 有《行过江上弋雁赋》、《行弋赋》、《弋雌得雄赋》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二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。明杨慎《丹铅总录》云：“刘向赋雁云：顺风而飞，以助气力；含芦而翔，以避矰缴。”杨慎所录，虽无标题，但大致不出这三篇)

6. 待诏冯商作《灯赋》。(《艺文类聚》卷八〇引刘向《别传(当作“录”)》云云)

7. 商字子高。(严可均《全汉文》谓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注引。今按：此语不见于《汉·志·诗赋略》“冯商赋”条颜师古注，而见于《春秋略》“冯商所续《太史公》七篇”条颜注引韦昭语，似不应断为《别录》佚文。今录以备考)

8. 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。(《汉书·艺文志》颜师古注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)

9. 骠骑将军史朱字。(《汉书·艺文志》颜师古注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)

10. 隐书者，疑其言以相问，对者以虑思之，可以无不喻。(《汉书·艺文志》颜师古注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)

11. 有《丽人歌赋》。汉兴以来，善雅歌者鲁人虞公，发声清哀，盖动梁尘。[《文选》李善注引作：……远动梁尘。其世学者莫能及](《艺文类聚》卷四三引刘向《别录》云云。又见《文选·啸赋》注，《事类赋注》卷一一，《初学记》卷

一五)

这些辑文是否真的全部出自刘向《别录》，现在已很难一一考辨。但它们辑自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事类赋注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汉书注》等诸多典籍，不可能全属作伪；并且以上各书大都是唐人所撰，有的还出自六朝，当时《别录》原文尚未佚失，若有人作伪，定会受人指责^④。所以，刘向《别录》中定有不少内容论述汉赋，换言之，刘向肯定为汉人赋作撰写了叙录，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。出于征引者的特殊需要，他们较多地征引了《别录》中关于各家赋标题（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1条），赋家生平（第6、7、8、9、11条）的内容，兼及校勘经过（第8条）、赋作构思（第10条）、创作主旨（贾谊赋条）、归类分析（第10条）等。或许《别录》本来的内容还远远不止这几个方面。综上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刘向为汉赋所作的叙录，有着非常具体、丰富、细致的内容，与今存的《战国策叙录》、《晏子叙录》等没有什么两样。此外，佚文中有一条论贾谊，而贾谊是《诗赋略》中位置非常靠前的赋家（第一类即屈原赋之属的第六位）；还有一条论隐书，而隐书是所有辞赋的最后一家（第四类即杂赋之尾）。由此可见，刘向生前可能已为所有的辞赋作家都撰写了叙录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赋整理、研究、评介工作，涉及赋家之多（有名字可考者约60家），赋作数量之巨（900余篇），研究范围之广，评论内容之丰富，不仅空前，而且绝后。尽管各家赋叙录几乎已全部失传，但它们必定对当时及后代的汉赋解读、传播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三、汉赋的分类

在遍研西汉赋作、撰写各家叙录的基础上，刘向父子还对汉赋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归纳与分类工作。孙钦善先生认为：“刘向汇

集众书序录而成《别录》，并不是将各书序录杂乱无序地凑在一起，在编排上当是以类相从。其大类从校书时的分工可以推知。”“至于大类下的小类，有些也是刘向等校理群书时所分，并不是至《七略》始有。”^⑤可见《七略》虽出自刘歆之手，其实也反映了刘向的目录分类学思想。《七略》也在唐以后佚失，由“删其要”而成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可知，刘氏父子将周秦西汉的诗赋分为五个小类。除去第五小类“歌诗”，前四个小类皆为辞赋。

第一类是屈原赋之属，包括：屈原赋 25 篇，唐勒赋 4 篇，……王褒赋 16 篇，^⑥凡 20 家，361 篇。除去楚屈原、唐勒、宋玉赋 45 篇，实际上著录汉代辞赋凡 17 家，316 篇。至于此类辞赋的特色以及分类的具体标准，刘歆、班固都没有任何交代，后人颇多推测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说此类为“写怀之赋”，“即所谓言深思远，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”，顾实先生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也说是“盖主抒情者也”，都非凿空之论。屈原《离骚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抒情长诗，其《九章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等都有浓郁的抒情色彩；今存唐勒、宋玉、贾谊、刘安、汉武帝等人的辞赋也都以抒情写怀为主。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《天子游猎赋》，该赋是大赋体制的奠基，的确是声情少而丽辞多，“长于叙事，而或昧于情”（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）的作品，显得不伦不类。但相如赋凡 29 篇，今仅存 7 篇，其中的《哀二世赋》、《长门赋》、《美人赋》皆主抒情，亡佚的 22 篇赋中或许还有更多的抒情篇什。相如的大赋成就高，影响大，这是事实，但不能据此否定抒情赋是他创作的主体。所以，刘师培、顾实的推测是不能驳倒的。此外，刘向父子将屈原赋置于《诗赋略》之首，显然有尊屈原为辞赋祖的意思。这种认识始于司马迁，但都未明言，至东汉班固才在《离骚序》中明确提出了“其文弘博丽雅，为辞赋宗”的观点。

第二类是陆贾赋之属，包括：陆贾赋 3 篇，枚皋赋 120 篇，……驃骑将军朱宇赋 3 篇，凡 21 家，275 篇（《汉书》原作 274 篇，盖

有误)，全属汉代辞赋。班固自注“人扬雄八篇”，除去这8篇赋，在《七略》原本中此类赋应为267篇（或266篇）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称之为“骋词之赋”，“即所谓纵笔所如，以才藻擅长者也”，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也说是“盖主说辞者也。大概此类赋，尤与纵横之术为近。”都有一定的道理。此类赋以陆贾为首，但陆赋今已失传。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云：“汉室陆贾，首发奇采，赋《孟春》而选典诰，其辩之富矣。”可见陆贾《孟春》等赋富于才辩，辞藻华丽，颇有纵横家驰骋翰藻、汪洋辟阖之风。其他各家赋作多佚，而《汉书》将朱建与陆贾同传，亦辩士之流；枚皋、严助、朱买臣等工于言语，严助亦纵横之流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之于纵横家），司马迁、冯商皆良史之才，《史记》也颇带纵豪横壮之气。存赋较多者为扬雄，但扬雄赋有8篇是班固后来加进去的，不能代表刘向父子的意见；况且其早期创作的《长杨》、《校猎》诸赋辞藻富丽，亦近乎骋词之赋。大概此类赋作多取法于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及战国纵横家说辞，铺张扬厉，气势充沛，颇具感染力与说服力。章学诚以为汉赋中有“苏、张纵横之体”（《校讎通义·汉志诗赋》），应该就是指这类赋作。

第三类是孙卿赋之属，包括：孙卿赋10篇，秦时杂赋9篇，……左冯翊史路恭赋8篇，凡25家，136篇。除去荀卿及秦杂赋，实际上著录汉赋23家，117篇。刘师培称之为“阐理之赋”，“所谓分析事物，以形容其精微者也”，顾实也认为是“盖主效物者也”。此类赋多亡佚，今惟存荀子《赋篇》及《成相篇》（或以为《赋篇》）有《礼》、《知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、《佹诗》凡6篇，《成相篇》亦5篇，共得荀卿赋11篇）。《成相》颇具民歌风味，但已近于赋体，其考列往迹，阐明事理，已开后世之连珠；《赋篇》实取法民间隐语（谜语），然即小验大，析理至精，阐理至明，发人深省，故可称之为阐理之赋。旨在阐发义理而状物精切微妙，当为此类赋之特色。

第四类是杂赋，包括：《客主赋》18篇，《杂行出及颂德赋》24篇，……《隐书》18篇，凡12家，233篇。难辨其产生年代，但多出西汉，当无可疑。顾实曰：“此杂赋尽亡，不可征。盖多杂诙谐，如《庄子》寓言者欤？”实属推测，未必准确，如其中《杂中贤失意赋》、《杂思慕悲哀死赋》皆为感情伤痛之作，必不与诙谐嬉笑之《庄子》同俦。推其本意，当是有一批作者失考或者不宜归入前三类的赋作，不能弃掷不论，故全部归入第四类，统名之为“杂赋”，又因屈原、唐勒、宋玉、荀卿赋及秦杂赋已见录于前，故判断此类杂赋，大都是汉人的作品^⑦。萧统编《文选》时，将无法归入前几类的歌谣与诗作名之为“杂歌”与“杂诗”，放置在诗类之最后，盖与此相类。但刘氏父子并没有将这233篇“杂赋”杂乱无章地放置一起，而是把不同内容、题材及写法的赋作略作区分，各编一集，这在文献学史和汉赋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其中《客主赋》18篇，必是假设主客问答以组织成篇的赋作，如子虚、乌有，子墨、客卿之类，因系汉大赋之体制而列之于首。《杂行出及颂德赋》24篇，盖赋家随帝王出行时所进献的歌功颂德之作；《杂四夷及兵赋》20篇，应是外交及战争题材的篇什；《杂中贤失意赋》12篇，恐怕与司马迁的《悲士不遇赋》、董仲舒《士不遇赋》属于同一题材；《杂思慕悲哀死赋》16篇，应与《文选》的“哀伤”及“情”类赋相似；《杂鼓琴剑戏赋》13篇，主要描写击鼓、奏琴、舞剑、杂戏之类，应负载着很深的文化内涵；《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》16篇，显然是一部山水风景气象赋的结集；《杂禽兽六畜昆虫赋》18篇，则与今存公孙诡《文鹿赋》、路乔如《鹤赋》、尹湾汉墓出土之《神乌赋》无甚差别；《杂器械草木赋》33篇，则为今存刘胜《文木赋》、邹阳《几赋》、羊胜《屏风赋》之俦；至于《大杂赋》34篇，又是《杂赋》中的杂赋，是一批在《杂赋》诸类中也找不到归属作品。另外还有《成相杂辞》11篇，恐怕与荀卿《成相》相似；还有《隐书》18篇，据《别录》佚文

及《文心雕龙·谐隐》，应是“遁辞以隐意，譎譬以指事”的谜语，但含义深刻，耐人寻味。不著作者的《杂赋》一类，最能向我们展示汉赋描写题材及艺术手法的多样性，因而具有前三类辞赋无法替代的价值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其中必定包含有不少民间俗赋，因正统文人的轻视而未能流传下来。这些俗赋具有独特的思想风貌、艺术价值及文学史地位，曾对当时及后代文学，尤其是说唱文学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。刘向父子对此类赋的整理与著录，为后人研究两汉俗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。

以上对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所著录的四类赋逐一进行了介绍与分析。这四类赋的总数为 78 家，凡 1005 篇；剔除楚秦辞赋 5 家，64 篇，及班固补入的扬雄赋 8 篇，实际上被刘氏父子整理分类的汉代辞赋约为 73 家，933 篇。仅就数量而言，也是空前绝后。清人陈元龙也曾校理汉赋，但由于当时的汉赋作品已十不存一，他在《历代赋汇》中所辑录的汉赋仅有 46 家，126 篇（包括残篇）。今人费振刚等先生编纂的《全汉赋》是目前辑录汉赋最全的著作，但也只辑得 83 家，293 篇（包括存目、残篇），较之刘向父子已规模大减。这里还有两点值得注意：（1）刘氏父子持有大汉赋观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楚辞体、赋体、颂体、七体，以至《成相杂辞》、《隐书》，皆可称之为“赋”。这与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固等人的看法基本一致，实际上反映了汉人的一般认识。辞、颂、七体入赋，至今仍有不少学者认同；但对于《成相杂辞》11 篇及《隐书》18 篇，则历来颇有非议。如周寿昌《汉书注校补》说：“据刘向《别录》言，则近乎庾辞，绝非赋体，乃与《成相杂辞》同入赋家何也？”汉代处于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，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还很模糊，作家与学者们都没有明晰的文体学概念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刘向曾编辑过《楚辞》，而实际上他只是把楚辞当作赋体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样式，并没有视为另一种文体。（2）至于分类的原则及标准，因《别录》之说湮没无闻，刘歆、班固也未置一

词，遂使后世学者颇多推测。明胡应麟《诗薮·杂编卷二》首倡“杂赋”为“后世总集所自始也”之说。清人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乃云：“（前）三种之赋，人自为篇，后世别集之体也；杂赋一种，不列专名，而类叙为篇，后世总集之体也。”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发扬章说，以为：“客主赋以下十二家，皆汉代之总集类也（此为总集之始）；余则皆为分集。而分集之赋，复分三类：有写怀之赋，有骋辞之赋，有阐理之赋。”章炳麟《国故论衡·辨诗》亦云：“屈原言情，孙卿效物，陆贾赋不可见，其属有朱建、严助、朱买臣诸家，盖纵横之变也。”四人所论，皆中要害。屈原赋之属主抒情，体兼比兴，言近旨远；陆贾赋之属骋丽辞，纵横才思，旨诡词肆；荀卿赋之属阐义理，体物精微，理深味长。在赋多散亡、文献失载的情况下，我们至多只能作如此推论。按刘歆《七略》的体例，《六艺略》分易、书、诗、礼等九种，《诸子略》有儒、道、名、法等十家，各家（种）之间区分鲜明，各有渊源，而汉代经师恪守家法，抱残守缺，已成一代风气。据此，抑或刘氏父子亦将楚秦西汉赋分为屈、陆、荀三家欤？在刘氏眼中，三家亦源流判然，特色各异，俨然为辞赋之三大宗。但刘氏父子并未死守旧规，泥古不化，而是尊重事实，态度审慎，他们将不能归入这三家的赋作（也可能全是无名氏作品）又单列《杂赋》一类，以免削足适履之讥。刘氏父子对每位赋家的赋作都整理校勘，编定目次，撰写叙录，结为一集，这当是非常规范的作家别集；杂赋诸种，区分细密，以类相从，又应是总集之始。梁孝王、淮南王等门下应该有赋集出现，但史料缺载；刘向父子无疑成了历史上的总集、别集之祖。

注：

①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叙传》及《山海经》、刘向《别录》佚文等典籍，参加这次文献整理工作的至少还有任宏、尹咸、李柱国、杜参、班固、臣望、

刘伋等人。但主要负责人是刘向、刘歆父子。

②至于班固删改《七略》的情况，可参考高路明《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》，第72~77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。

③孙钦善：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，第109页，中华书局1994年2月。

④据顾实：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仍著录刘向《七略别录》20卷，刘歆《七略》7卷。《通志》也著录《七略》，但《通考》已无。看来二书相继亡于唐末及南宋。

⑤孙钦善：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，第110页，中华书局1994年2月。

⑥限于篇幅，不具引。详参《汉书》第六册第1747—1756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。以下三类同此。

⑦万光治先生《汉赋通论》亦云此类杂赋“大抵是汉代佚名者之所为”。见该书第11页，巴蜀书社1989年12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